

叠，但基本上各有侧重，反映了新时期中国民俗学会的整体结构和工作运转的整体状况。来自专业管理干部代表的发言，引人注目。他们懂业务，抓管理，想方设法解决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困难，为研究者提供条件，保证他们所在单位的民俗学队伍的稳定和发展。他们以学术思维进行管理的成绩和奉献精神，对于三支队伍的多元一体发展，起到了内在推动作用。

中国民俗学成为今天这样一门现代科学，体现了它既有现在性，又有开放性。它包罗万象而自成一格，继续在做自己的中国学问。

### 三

与近年雨后春笋般涌起的新社团不同，中国民俗学会有自己70年的学术历程。

70年来，这个学术机构拥有一批享誉国内外学坛的著名学者，如刘复、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容肇祖、黄石、赵景深、江绍原、杨成志、杨堃、马学良、白寿彝等。在这门学术开拓之初，他们面临世界发达国家人文科学思潮的袭来和民族文化生存的危机，曾作报春的红梅。钟敬文教授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他的学术思想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有利于这门学科的理论建设。老一辈民俗学家们形成一个学术带头人团体。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至今还是中国民俗科学的脊梁。他们使中国民俗学会具有自己的治学传统和科学风度。

老一辈民俗学家在学坛上的长期声望和至今在发展的学术成就，庇荫后学，延续传统。新一代民俗学者迅速成长，新绿映眼，他们使中国民俗学充满活发生机，难得千里绿映红。

换届选举是本届大会的第三项议程。代表们在充分酝酿、集体协商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以钟敬文教授为领导的，老、中、青相结合的中国民俗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圆满完成了会议预期的任务。

应是绿肥红瘦。新一届领导班子是中国民俗学兴旺的保证。

在与会代表的期望与信任中，钟敬文教授代表新一届理事会，向大会致闭幕词。他殷殷寄语同志：“大会结束后，大家又要奔向四面八方，走上各自的教学、科研和其它工作岗位；又要在民俗文化的田野中默默无闻，辛勤耕耘。有耕耘，有播种，就会有收获。惜别还会重逢。希望我们再次相聚时，看到大家硕果累累，看到中国民俗学的辉煌景象”。

## ● 杨利慧

新时期中国民俗学  
复兴的社会背景

“民俗”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为了生活的需要所创造、继承和传播的一种社会文化，它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民俗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开始的阶段，而民俗学——以搜集、整理和研究民俗现象为职责的一门科学的国际名称（Folklore）的最初提出还是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是由考古学家W·J·Thoms用萨克逊语拼合而成。以后这一名称先后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并相继成立了有关的研究机构。一个多世纪来，国际民俗学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我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民俗学发展条件。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积淀了丰富而又复杂的民俗事象，多民族的文化构成更为民俗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在我国古代文献典籍中，很早便有了对民俗事象的记载，以后的某些记述还带有一定的系统性，甚至也涉及到了边缘民族及国外其他民族的习俗。这些记录文字大都是描述性的，其中有一些（尤其是到了晚清时期）表现了记述者对民俗现象的初步思考，闪烁着理性思维的光辉。不过，总的说来，到五·四民俗文化运动以前，我国对民俗事象的记录还是零散的、局部的，对它的研究更是无意识的，处于前科学的状态。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酝酿与展开，应着反帝反封建、呼唤科学与民主的民族之声，民俗作为民族中下层文化得到了空前重视。1918年初，刘半农、蔡元培、沈尹默、周作人等在北京大

学发起成立了“歌谣征集处”，为中国民俗学的掀天事业撒播下第一粒火种。此后，经过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及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努力拓展，以及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搜集研究工作，到新中国成立时，民俗学在理论研究、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绩。<sup>①</sup>

解放后，由于新中国特殊的国体性质（人民民主专政）和划分族属、教育民众等需要，民间文化还是得到一定的发展。民间文学作为“人民口头创作”（受苏联影响）在建国初期的部分高校中仍然开设；并培养出了第一代硕士研究生；1950年还建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并办有专刊；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较大规模的综合考察，也为民俗学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是民俗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并没有建立起来，它被错误地派定为“资产阶级学术”而受到冷遇甚至批判。十年浩劫中，民俗学几乎成了绝学。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逐步活跃，我国民俗学运动也在冷寂多年之后，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自1979年7位老专家公开提出“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以来，十几年中，民俗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专业机构来说，继辽宁、吉林、浙江等省的民俗学会之后，中国民俗学会也于1983年在北京成立。到目前为止，各种民俗学会、学社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不少省市还成立了民俗博物馆。民俗学队伍空前壮大。从出版方面来说，既有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其中作为国家科研重点工程的“三套集成”工作尤为中外学者所瞩目），也有民俗学理论著作

---

<sup>①</sup> 参见钟敬文《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杨堃《民俗学与民族学》（以上均见《民俗学讲演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

(包括概论与专题研究著作)的不断问世;既有古、近代民俗资料及论著的重新刊印,也有国外民俗资料与理论著述的翻译评介……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的成立(现因故停办)为民俗学界贡献了大批专业书籍,为新时期民俗学的恢复、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持与推动作用。另外,一批民俗学专门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北京的《民间文学论坛》、《民间文学》、山东的《民俗研究》、上海的《中国民间文化》、《采风》、广东的《岭南民俗》、《广东民俗文化研究》等,为新时期民俗学园地增添了无限生意。在教育宣传方面,许多大专院校纷纷开设民俗学课程或举办有关讲座,中国民俗学会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还分别举办了民俗学讲习班、民间文学刊授与函授大学。到目前为止,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专业还拥有—个博士授予点,全国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享有硕士授予权。尤其令人振奋的,是钟敬文教授正率领一支生力军,积极进行《民俗学概论》的编写工作。这本高校教材的问世,将为民俗学在我国落地生根起到巨大作用。在学术交流方面,国际、国内民俗学研讨会已召开多次,其中“中日民俗异同与交流”大会、“中国耿村故事家群及作品和民俗活动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民俗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中国中青年民俗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都颇具规模。此外,我国民俗学工作者还与日本、美国、瑞典、德国、芬兰、泰国、韩国等国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或联合考察。<sup>①</sup>由上述粗略提及的情形可以看出,新时期我国民俗学的发展的确是“盛况空前”。事实上,它在80年代中期还成了众所乐道的“热门学术”。

<sup>①</sup> 参见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王文宝《十年来我国的民俗学研究》(《文史知识》1989,5)《我国民俗学运动新兴时期的腾飞》(《风俗通》,1991,3)以及梁木森《近年来我国民俗学基础理论研究综述》(《民俗研究》,1988年,2~3期)。

那么，新时期我国民俗学复出并得以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呢？

应该看到，这一复兴与世界范围内的民俗学热潮是有联系的。

#### （一）民族解放运动中民俗学地位的上升。

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的许多中小国家纷纷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下挣脱出来。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斗争中，民俗文化成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可利用的重要手段，因为民族的民俗文化是该民族人民的共同产物，它表达了该民族特有的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态度与情感，镌刻着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得来的经验和教训，显示着人民的智慧和力量。通过它，不仅能在被压迫人民心中唤起民族的自豪感与反抗殖民者的斗志，而且，它还使新生的国家能从自身的传统中汲取丰富的素材，以形成共同的语言、文字和历史，从而造成一种新的、令本国人民有归依感和认同感的民族精神。于是，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中，民俗文化作为民族的一个特色标志和长期赖以依托的精神力量，在很多国家都受到重视。这改变了民俗文化在世界文化中长期被忽视的现象，使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地位有了明显的上升。以芬兰为例，1809年，芬兰同瑞典达700年之久的联系被斩断，就成一个附属俄国的自治大公国。“这意味着借助文化造成一种新的民族团结的感情，芬兰语成为上流社会的语言，根据民间诗歌改编成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成为芬兰文学的奠基石。在以后赢得政治上的完全独立、祖国的自由解放而进行斗争的100多年中，民间文学对唤起芬兰的民族自尊心、振奋其民族精神，对形成统一的芬兰民族语言和文学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史诗《卡勒瓦拉》在芬兰享有崇高的地位和特殊的影响，它的纪念活动往往成为全国性的盛大节日。民间文学的搜集、保护和研究工作也受到重视，至今已有丰富经验。

(二) 现代化进程中的“复归”与“反思”热潮引起了对民俗文化的注意。

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与迅速发展,西方社会的物质生活极大繁荣,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例如都市生活中人际关系的隔膜、大机器生产对人性的压抑与扭曲、潜在的精神焦虑、能源危机与核战争的威胁等等。这使一些人产生了对现代社会的怀疑和厌倦情绪,怀恋起过去古朴淳厚的生活,因而提出要“复归自然”。怀着这种恋旧心态,朴野清新的民间民俗文化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有些人记录了乡间的民谣和传统的服饰及劳动工具;一些艺术家还去黑人及其他边缘民族中寻找音乐、绘画创作的素材与灵感。这使民俗学在很多人心目中变得亲切了,其价值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与这种“复归”心态相映衬的,是西方一些国家出现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热潮。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批判传统文化的书大受欢迎,例如英国诺斯古德·帕金森著的《帕金森定律》、法国阿兰·佩雷菲特著的《法国病》,批判的矛头都指向传统文化的消极面,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我国,还出版了《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美国人》中译本、《丑陋的日本人》中译本。从这些书中反映出在现代化进程和世界开放形势下,各国为探寻和调整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为加速现代化的步伐而对阻碍其发展的民族传统文化消极面进行的反思与批判。虽然这些探讨大多局限于文化的中上层,但在对传统文化与民族性格进行思索的过程中,民俗文化(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了普遍关注。

(三) 开放世界中民俗学的特殊功用。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面开放的世界。一方面,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迅速发展,一国经济开始向世界经济逐步转化,世界各国就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另一方面,现代高科技成果极大地缩短

了各国间的相对距离，为频繁地进行国际交流提供了方便。在开放与交流、竞争与发展的世界局势中，了解、认识其他民族的民俗文化以适应外交、外贸等活动的实际需要已成为迫切的要求；同时，如何在开放交流中保持自身的特色，也是不少国家（甚至发达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例如在冰岛就产生了“两代人”的问题，年轻人片面追随西方现代派思潮而不知民族传统。冰岛政府为抵制现代派的侵蚀、使年轻一代不忘民族传统，教育部决定从中学起教民歌。这说明民俗学不仅可以成为沟通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纽带与桥梁，还可以成为抵制外来文化侵略的有效武器。

种种因素使民俗学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价值，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地位，一时成为与语言学、文化学鼎足而三的国际“显学”。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应该研究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并对增加万国版权公约提出建议。这是国际组织关心民俗学的开始。此后十多年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关怀与赞助下，许多国家为搜集、保护和研究民俗文化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并成立了有关机构，如芬兰的“民间文学档案馆”（建立较早），美国的“民俗学会”，日本的“文化厅文化财保护部”等。

国际上的“民俗热”对我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6年，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召开期间，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议精神，向大会提交了“关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建立我国各族民间文艺、民俗馆的提案”。在这一举动的感召下，不久又由全国政协文化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了“保护民间文化座谈会”，呼吁社会各界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各民族的民间文化遗产。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后，我国民俗学便立足于自身的历史土壤、特点与需求，尽力与其他国家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国外有效的保护民间文化的措施、现代化的田野



作业方法、实证的科研态度以及人类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分析学派、原型批评、结构学派等各种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给了我国民俗学者以多方面的启迪，从而对新时期我国民俗学的兴旺发展起到参考借鉴甚至推波助澜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民俗学的复兴是在新时期的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它的迅速崛起与蓬勃发展与我国新形势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变化发展有着更直接的、根本的联系。

(一) 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给民俗学界带来的新气象。

十年浩劫中，民间文化被作为封建文化打入冷宫，民俗学、民族学等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受到批判。一些院校中开设的“人民口头创作”课程也被取消，宝贵的民俗资料散佚殆尽，研究机构被迫关门、学术刊物被迫停办，专家学者被打入牛棚。民俗学事业受到极大的摧毁。

粉碎“四人帮”后，极左路线受到批判，随着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被颠倒了的东西又被颠倒过来。各门被冷置多年的“资产阶级学术”始得恢复名誉、重见天日。劫后余生的老知识分子又开始为学科的重新建立奔走呼号、伸头直言。这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问题和实事求是原则的讨论，使数年来遭压制束缚的科学求真精神得以恢复、解放，百卉凋零、禁区重重的思想文化领域逐渐出现了宽松的气氛。各门被错误地打倒了的学科便借着这时代的春风，重新绽放出生命的绿芽。老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在一篇序言中讲的话，颇能反映出这一阶段民俗学界的变化：

一些搅世魔王被打倒了。左的文化路线被矫正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文艺学，特别是民俗学的命运回转了。个人的遭遇也得改变。我们可以正常地从事自己的专业，发挥自己的才智了。你的这个集子，就是在

这个新时期的气候和土壤里开花结实的<sup>①</sup>。

也是在这个气候下，1978年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等七位老学者向中国社科院发出了重建民俗学及其有关机构的倡议书。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复兴便在老一辈专家学者们的努力下敲响了出台前的第一阵锣鼓。

(二)“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实施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大力发展生产力”上来，并将改革开放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实行十多年来，不仅使我国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对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是对我国现存的经济管理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方面面进行改革，并使之朝着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方向转化，从而推动现代化的发展。然而新旧两种经济体制转换的同时，与之相适应的新旧观念也必然产生尖锐的冲突。所以，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带动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观念的变革。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是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基础上，打破过去闭关自守的局面，扩大对外贸易，加强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合理利用外资，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开放、搞活相应的，是思想文化领域里逐步形成的宽松和民主的氛围，僵化、封闭的“大一统”模式开始向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的多元化方向发展。新学科、新学派、新思潮、新方法不断涌现，学术界广泛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各种文化组织纷纷成立，如民族学会、社会学所、民俗学会、人类学会等等，它们出版刊物、举办学术研讨会、积极介绍国外学术信息，使新时期学术领域出现

<sup>①</sup> 《〈神话、传说、民俗〉代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

了十分活跃的景象，尤其是各门社会科学，更如枯木逢春，迅速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要革除的不仅有我国落后的经济生产与管理经营形式，还有与之相适应的一些陈旧落后的价值观念与风俗习惯，因为它们已成为经济改革的严重阻力。另一方面，随着国门的开启，与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一同流入的，不仅有西方合理的人文思想和科研方法，还有一些与资产阶级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后者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民族精神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于是，在变革自身与保持特色、在吸收借鉴与抵制外来文化侵略的双重形势下，围绕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中心问题，从1982~1988年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否定传统与复兴传统”、“全盘西化与抵制西化”、“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民族寻根与走向世界”的讨论热潮，时人谓之“文化热”。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加深国人对民族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的认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场文化讨论中，作为民族文化重要基础部分的民间文化虽然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但大多数讨论还是局限在上层文化。针对这一现状，民俗学界作出了积极反应：大力介绍我国民间文化，宣扬它在日常生活、对外交流及国民教养上的不容忽视的独持作用，并推出相应的研究成果。《话说民间文化》、两套“中华本土文化丛书”（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开始推出以及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等都是这一热潮中民俗学献上的独特浪花。对“文化热”起到了一定的纠偏补漏的作用，也将我国民俗学的影响播及全国及海外。

###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时代需要。

新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生活现象的民俗，也不免产生了种种变化。一方面，一些旧习惯、旧观念死而不僵，这时又陈渣泛起，死灰复燃。迷信思想依然束缚着人们的心智。在农村，富裕起来的农民将血汗挣来的钱用于修

祖坟宗祠，大办婚事，跳神赶鬼，甚至一些共产党员也迷信风水、利用耕地修“生人祠”。这些弥漫着浓厚宗法制与小农经济色彩的旧风俗习惯极大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很多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而迅速地变化乃至逐渐消失。因此，在这社会空前变革时期，如何加强国民素养、革除那些旧观念、旧习俗？如何保护那些变化消亡着的民族传统的文化和观念（作为文化史的宝贵财产）？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一个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都成为时代提出的迫切任务。新文化的建立，需要继承发扬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多方吸收借鉴其他国家有益的、合理的文明成果与建设经验。因此，对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统文化（包括民间文化）进行调查、收集、整理、保护和研究就成为必要的基础建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其中的精华部分淘捡出来，使之成为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些现实问题的提出和急待解决为新时期民俗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新时期我国民俗学的复兴是有着历史必然性的。它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和几十年的经验积累（复兴的可能性），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迫切需要的（复兴的必要性）。于是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及世界范围内活跃的文化思潮与民俗学发展热潮的影响下，一经老一辈民俗学家点燃火种，十几年中已酿成燎原之势。其发展之迅猛、队伍之壮大，不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当初提出倡议的老学者们也没有料到。

值得提出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中国民俗学的初次崛起与再次勃兴分别发生在本世纪初及末，都是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而产生的。前不久的“文化热”大讨论中，有人主张新时期的文化讨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延伸和继续。这一看法

是否确当，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仅就民俗学的情况来看，虽然它在新时期的发展与五四时期的民俗文化运动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但其性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研究队伍的构成及其所取得的成就都大有不同。（一）就性质来看，五四时期的民俗学运动是新民主主义的，是在反帝反封建、呼唤科学与民主的时代背景下酝酿产生的。而新时期的民俗学则是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恢复发展起来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旗帜下进行的。二者性质不同，所面临的任务也不同。（二）就其研究的领域来看，五四时期主要在民间文学方面，虽然《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强调“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但其搜集研究的范围主要只限于歌谣、故事（童话）、神话、传说等方面，角度也主要是文艺学的。新时期的民俗学已开始具有强烈的学科意识，其研究对象已大大超出文史领域，而深入到人民生活的物质、精神、语言及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如民间的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生产、游艺、社团、信仰、口头文学等，都是民俗学关心的对象。（三）就专业队伍的建设（构成）情况看，五四时期主要是由专家学者们组成的，规模不大，成分也比较单纯（多为文史工作者）。今则不然。民俗队伍空前壮大，从各省市到地区，民俗学工作者及热心于民俗工作的同志数以万计，其中有专家学者，也有乡村干事；有文化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有高校中培养起来的大批青年……。队伍中不光有文艺工作者，还有从事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法律学等各项事业的同志。这支队伍的构成，有利于从多角度进行民俗学研究，从而将民俗学推向科学发展的轨道。（四）从所取得的成绩来看，如前面提及的，新时期民俗学在理论研究、田野调查、出版发行、教育宣传及搜集、整理与保护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就。尤其是近些年来频繁进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联合考察以及为日本、德国、美国等培养高级

专业留学生等，表明中国民俗学已开始显示出自己的主体性，在国际民俗学界占有着自己的位置。这与五四时期对国外民俗学的介绍、摹仿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尽管两次民俗学的兴起都是传统文化阵痛的产儿（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但毕竟二者置根的历史土壤已有质的不同。如果说五四时期是中国民俗学发端的话，那么新时期则是它蓬勃发展和逐步深入的时期，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继续。

当然，新时期民俗学也暴露了一些弱点，甚至严重的缺陷。例如基础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田野作业的基本功还有待锻炼、提高，对西方理论不加分析鉴别地套用到中国情况上来等等。但是，这一复兴无疑极大地推进了对民间文化的研究，从而对新文化建设以至人类文化史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

## 中国民俗学会第五次学术 讨论会论文存目

黄河下游航运民俗	山曼
蒙古人的马祭	波·少布
中国桃文化浅析	金宝忱
中国的面具文化	陶立璠
萨满传说类型刍议	色音
赛龙舟习俗的楚文化风采	巫瑞书
巴蜀风俗文化特色初探	林忠亮
论民俗改革	李绪鉴
泉州与鹿港	黄炳元
传统文化的载体与象征系统	
——多维视野中的中国民间文化	郭崇林
我国多采的民族服饰习俗及其形成演变规律	陈子艾
山西煤文化与煤神崇拜	段友文
求雨习俗中的山神与龙	刘晔原
北方特有的民俗文化灯官考论	丁广惠
论民俗语源	曲彦斌
文革中的民俗文化现象	周星
盘瓠神话起源北方考	苑莉
云贵地区民族服饰文化类征初探	陈晓红
发扬民俗文化资源的价值光辉	杨绣绿
晋西柳林“盘子”庙会调查	白占全
传统岁时节日的形成及特点	李惠芳

黄河民俗调查中的原型层次		杨文龙
江苏省渔民俗调查八年回顾		刘兆元
经济转型期的婚俗		宋德胤
论民俗传统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	刘志文	谢丽华
妈祖文化热探源		祁金华
陈靖姑信仰及其传说的研究	叶大兵	叶丽娅
跳曹盖——一种古老的傩文化形态		李鉴踪
火把节的三种存在形式及发展轨迹		杨知勇
努力发展民俗学的社会应用		吕洪年
中国民俗文化的百花织锦图		宁 锐
民俗志编写放谈		刘其印
关于我国正统博物馆发展走向的几点意见		张建新
山东省近几年来民俗研究概述		叶 涛
试谈市场经济与民俗学建设		程思炎
崖葬习俗的成因及其文化内涵		万建中
苏南水乡元宵节习俗初探		魏彩萍
藏族民俗与藏区的现代化思考		赵宗福
“佛托玛玛”新探		塔 娜
傩戏、傩文化的开发、研究与田野考察		庾修明
盘古神话问答三题——关于民俗与民族文化的思考		张振犁
原始艺术的“哑语功能”		林 河
豫北地区祈雨、防涝习俗的调查与研究		郭松针
广州天河区石牌村“娘妈”信仰调查		曾昭璇
灾异、征兆、牺牲		
——从“陷湖”传说到“献身”故事		何红一